

大眾文學·敘事·文類

——武俠小說札記三則

● 鄭樹森

1977-79年和1982-84年，先後兩度任教香港中文大學，多次負責「現代西方文學理論」的課程。在小組討論時，由於同學背景紛雜，要舉列文學作品引申說明，每有共識難求之苦。倒是偶一援引大眾文學，例如當代武俠小說的「名作」，同學反能「心領神會」。如此因緣巧合，也就留下一些散亂的筆記。

以下三則，或可視為分析武俠小說的幾個角度。

大眾文學

武俠小說是一種大眾文學。這個通俗的本質使到武俠小說的「文化商品性」特強。但同是「文化商品」(cultural commodity)，「包裝」手段的優劣，對文化市場的消費實績，仍有重大影響。因此，雖是「大眾文學」或「通俗」文學，武俠小說仍不能一視同仁，粗暴地統一處理。

然而，在尊奉經史子集的中文學界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有時尚在殿堂之外，或僅能聊備一格，武俠小說雖是相當矚目的文化現象，但學術探討

上乏人問津，不難理解。這個情況和西方文學理論界早年的發展大略相仿。英美體系的形式主義文評(formalist criticism)，對作品好作孤立的、自身具足的「苦讀細品」，因此分析對象最好是七寶樓臺。不斷大量生產的大眾文學自然難入法眼。德國法蘭克福學派(Frankfurt School)雖然注重文藝社會學和大眾文化的研究，但對大眾文化的評價是相當反面的。阿當諾(T.W. Adorno)與霍克海默(M. Horkheimer)兩位法蘭克福學派大將，就都對大眾文化口誅筆伐，認定其消費本質是墮落的，其短暫快感是麻醉的，其整體效果是削弱消費

法蘭克福學派雖然注重文藝社會學和大眾文化的研究，但對大眾文化的評價是相當反面的。

者的省思能力；因此大眾文化無異於消費工業，是大量製作、傾銷、惡性循環的文化商品^①。類似的觀點亦見諸滯留美國的另一位法蘭克福學派社會學家李奧·路文陶(Leo Lowenthal)對泛濫書市的各界名人傳記的分析^②。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探討無疑是筭路檻褸，功不可沒。但今日反觀，其結論仍略嫌教條，對傳統的雅俗之別，稍過執着。

如果從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來看，武俠小說既為大眾文化之一種，評價和結論可思過半。但早期的法蘭克福學派的論點，對意識形態在大眾文化的辯證運作，似乎略有簡化。以武俠小說為例，即使是短暫的逃避現實的娛樂，但其廣受歡迎，長期風行，是否隱約反映出某種羣體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認同(empathy)？而這種認同的心理因素又有甚麼共性或殊性？此外，現在中國長期的苦難，與武俠小說逸離現實時空的短暫忘憂，是否有某種內心的連繫？又是否間接折射出桃花源或烏托邦的追尋？而武俠小說裏常見的傳統倫理、江湖道義，是否對某種舊秩序、舊倫理的眷戀和懷念？換言之，是否對現代工業文明社會帶來的心理焦慮及外在壓力的抒解方式？

意識形態在大眾文化裏弔詭的、辯證的運作，是美國當代新馬克思文論大師詹明信(F. Jameson)的獨特見解。詹明信認為，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商品，自然具備消費的、匱乏省思批判、絕大多數均欠缺藝術自覺性等性格；但這種文化商品有時也深藏某些理想成分，暗含某種烏托邦的元素，透過作品的熱鬧情節，在消閒上吸引讀者，但同時也反照出讀者內心裏無意識的渴求，間接滿足羣眾混藏的、

期望美好的慾求^③。女性主義批評家(feminist critic)珍妮絲·勒德威(J. Radway) 1984年探討美國通俗言情小說的專著，大體上肯定和證明了詹明信的理論推敲。勒德威採取問卷調查、直接訪問、集體對話的實證方式，以美國某社區的言情小說婦女讀者(此類小說沒有男性讀者)為對象，探究她們沉溺言情小說的根由。勒德威的一項發現是，這些女讀者在家庭生活和感情世界上，都有各種形式和程度的不滿^④。因此，最為通俗的言情小說，即有發泄盪滌之心理功用，也弔詭地反射出她們對較為美好和理想的生活或感情，朦朧的、自身無法用文字表達的慾望。由此觀之，武俠小說在華人社會的風行，似乎也可採取某種實證兼理論的研究模式，來作比較深入的分析。

從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的觀點來看^⑤，武俠小說無疑是「男性沙文主義豬獠」的最大心理滿足。因為武俠小說裏的男俠，幾乎永遠是所有美貌女俠或其他女性的追求對象。此外，心狠手辣的黑道邪魔也不時以尤物姿態出現，遙遙呼應中國文化傳統裏的「紅顏禍水」(femme fatale)。因此，從女權觀點來看，武俠小說肯定是「男權/父權」(patriarchy)意識形態上壓迫婦女的文化「幫兇」，要大批特批，自不在話下。也許有人會說，武俠小說裏的女俠或女魔頭，走出了閨房和廚房，是否可視為「女權/母權」(matriarchy)的伸張？表面上，女俠當要勝於傳統小說的一般女性形象。但實際上，由於女俠終究要成為男俠的附庸(如果我們用金庸的作品做範例)，顯而易見，女俠並不能視為對「男權/父權」的挑戰。

從西方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角度

武俠小說即使是短暫的逃避現實的娛樂，但其廣受歡迎，長期風行，是否隱約反映出某種羣體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認同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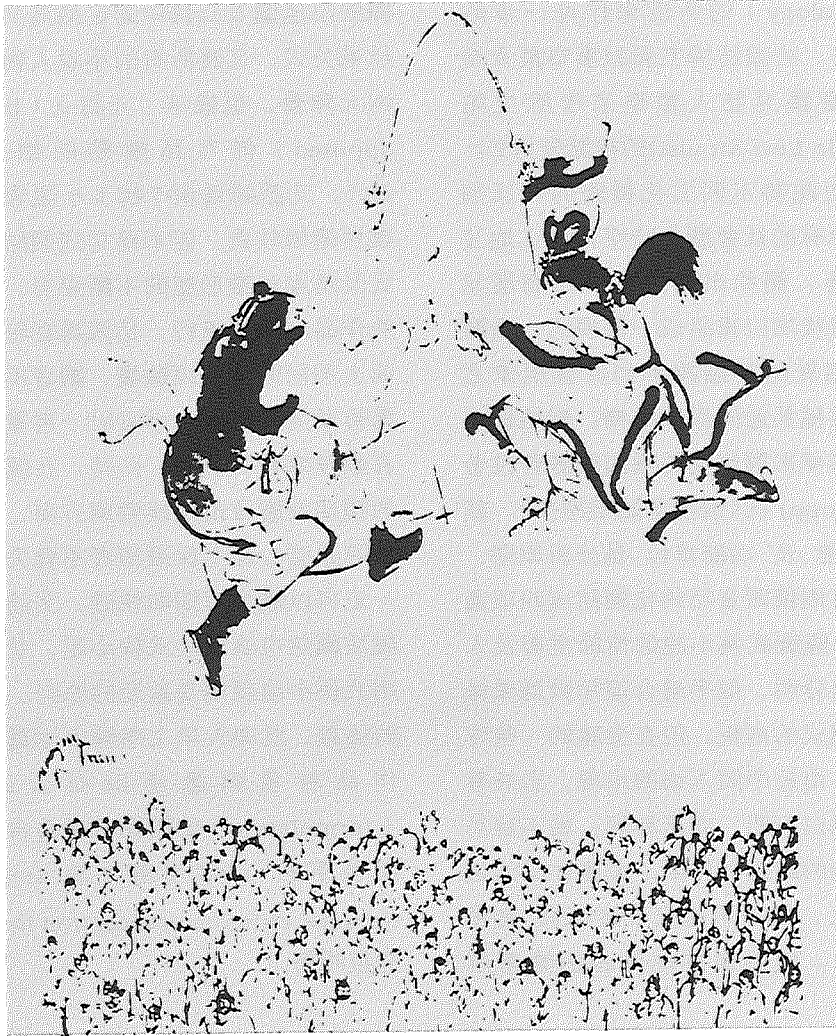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在金庸作品中，女俠終究要成為男俠的附庸，顯而易見，女俠並不能視為對「男權／父權」的挑戰。

出發^⑥，由於武俠小說不僅深受男性讀者歡迎，也廣為女性讀者閱讀（雖然人數上可能較懸殊）；因此，武俠小說還可從另一個角度進行批判。根據羅拉·馬爾維 (Laura Mulvey) 和德蕾莎·狄·羅瑞提斯 (Teresa de Lauretis) 的看法，傳統好萊塢主流電影，通過電影符碼、視覺造型、敘事快感及心理訴求等元素的綜合，不但鞏固「男權／父權」的意識形態的壟斷性，而且長期將女性形象塑造為「男權／父權」的「客體」，成為這種壓迫性文化及社會體制的附屬品。由於主流電影的普及和風行，男性觀眾不但將女性形象的「客體化」視為理所當然，連女性觀眾也因心理因素及電影所能

提供的快感，從而被動地、不加反省地接受這種「客體化」附屬形象，忽略了這些電影的男性中心，甚而失落了女性本身的「主體意識」，被這些電影「集體洗腦」。這個理論觀點似乎不僅適用於傳統好萊塢主流電影，也對武俠小說的女性讀者的「主體性」(subjectivity) 的構成，提供一個可以闡發的角度。

敘 事

武俠小說的敘事結構，往往由於不斷重複和大同小異，似乎很適合從結構主義敘事學 (structuralist

narratology) 的角度來作進一步的探討^⑦。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最大規模的實踐見諸人類學家李維史陀(Claude Lévi-Strauss)的神話分析^⑧。李維史陀將不同文化種族的神話抽離其原有的社會歷史時空，孤立地互為覆疊，簡約出功能相做的個別元素，然後加以重組成一個模式，凸顯表面迥異的神話故事和社會現象之下，某種共通的深層結構。對結構主義敘事學影響深遠的俄國學者普拉普(V. Propp)的《俄國童話型態學》，就以「功能」及「功能單位」為分析原則，將一百則俄國童話約化歸結成四項通則^⑨。傳統武俠小說的情節重複及人物黑白分明，似乎適合這類較為機械化的模式的剖析。但在金庸的一些作品裏，由於中間人物的出現，忠奸難辨，黑白不明，亦正亦邪，就不容易作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功能的歸劃和界限。

在金庸的一些作品裏，由於中間人物的出現，忠奸難辨，黑白不明，亦正亦邪，就不容易作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功能的歸劃和界限。

另一位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名家羅蘭·巴特(Roland Barthes)則曾指出，敘事作品的基本模式容或相做，但個別意義的產生，還有待閱讀時對既定的示意系統或「語碼」的掌握^⑩。他提出五種「語碼」作為分析手段。其中第一種「疑問語碼」(hermeneutic code)，傳統小說中最常見。一般而言，傳統小說重點和興趣是講故事，而講故事離不開賣關子，也就是製造懸疑、提出問題，使讀者「追」讀下去。就武俠小說常見的情節而言，這個語碼顯然最為突出。

意大利符號學專家翁柏圖·艾誥(Umberto Eco)早歲亦曾從敘述學角度研究伊安·法蘭明的007特工小說。艾誥將007特工小說全部覆疊，

簡約出他個人心目中認定最為共通的結構公式；又將所有的小說人物分成兩大陣營，也就是二元對立(binary opposed)但互為推動的價值系統^⑪。艾誥認為007特工小說表面上雖然繽紛歧異，但不過是這個結構公式及基本意識形態的不斷變奏。而這些作品之暢銷風行，是因為在每個表面上不同的閱讀經驗裏，讀者不會有驚奇及突兀之處，而可以一再重溫其喜歡及熟習的慣例。同時，在閱讀時的預期效應及預期娛樂兩方面，潛藏的熟悉感心理上保證讀者不會失望，一定可以滿足預期的快感。艾誥這個說法顯然也適用於武俠小說，並可說明武俠小說長期受歡迎的原因。艾誥的論證，既與大眾文學論者認為此類作品特重熟悉感因而公式化(formulation)的觀點不謀而合，又與後來的「讀者反應文論」(reader-response criticism or reception theory)先後呼應。

文 類

如果熟悉感和公式化是武俠小說作為文化商品的屬性，那麼武俠小說作為大眾文學裏的一個類型，又有甚麼特性？

文類的規範照俄國形式主義的看法，不外是表現手段和技法的組合。一個新文類的逐步出現，只不過是舊有文類的重新整合，也就是舊有藝術手段通過個別藝術家作出新組構。如以小說為例，作家從經驗和書本抽取出來或憑空想像的情節，可稱為「故事內容」或fabula；但作家的藝術組織和特定的個別呈現方式，亦即「敘述結構」或sujet，才是文類的決定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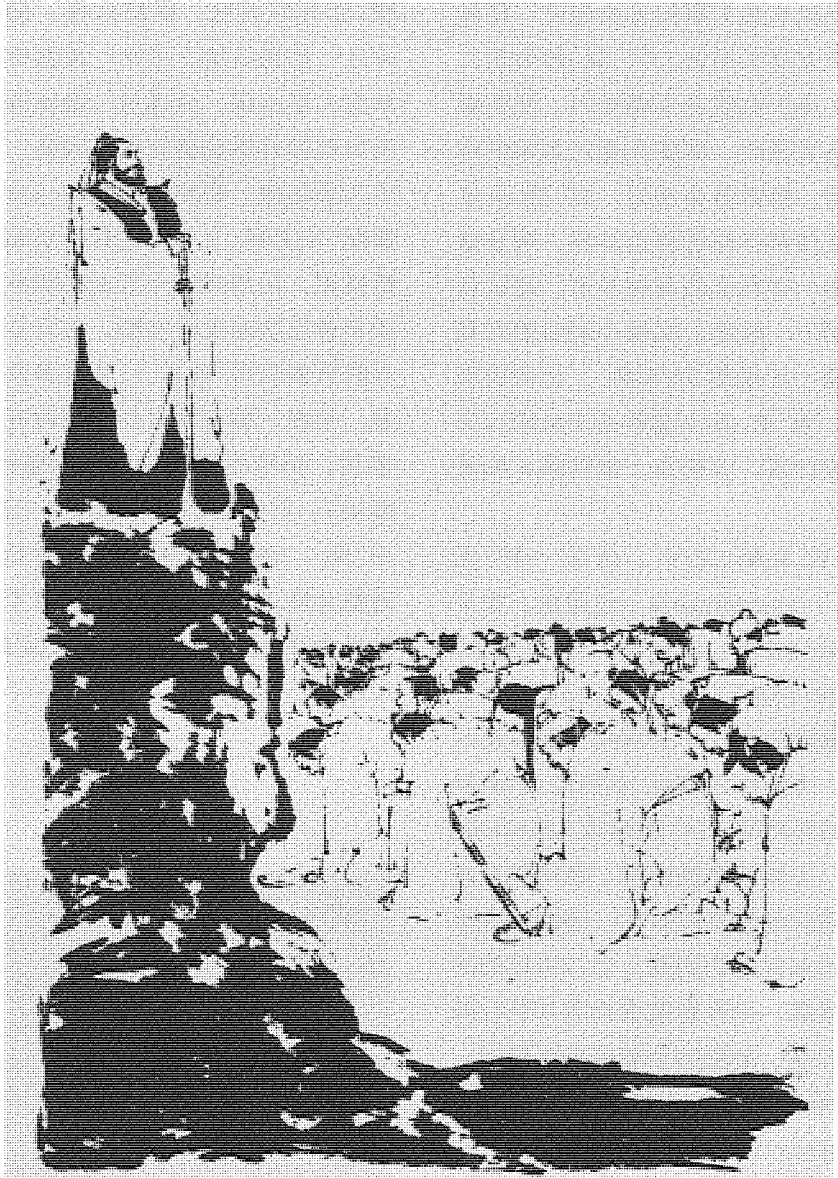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武俠小說逸離現實時空的短暫忘憂，是否與現在中國長期的苦難有某種內心的連繫？

因素。這是俄國形式主義大師謝克洛夫斯基 (Viktor Shklovsky) 的基本見解^⑬，也是湯馬謝夫斯基 (Boris Tomashevsky) 的看法^⑭。

在俄國形式主義轉化成捷克結構主義之後，謝克洛夫斯基對文類的看法仍極具影響力。例如穆柯洛夫斯基 (Jan Mukarovsky) 就認為文類本身是創作規則及手段穩定下來後構成的體系；好比下棋的規則自成一個系統，但進行棋戲時可以變化多端^⑮。出身自捷克布拉格語言學會的雷尼·韋禮克 (René Wellek) 的《文學概論》一書

也傾向這種獨標創作手法的看法。他說：「在理論上，文學作品的集中歸類應該同時顧及外在形式（特定的結構或律度）與內在形式（態度、語調、目的——更為粗糙地，也可包括題材及對象）。」^⑯

以上這些說法，對相當公式化、自我重複、相當缺乏個人原創性的大眾文學來說，無疑是陳義過高。同理，武俠小說的文類及「次文類」（sub-genre）之規劃，也不能依循這些適用於「高類」文學的標準，而只能就題材內容來作「較粗糙」的探討。

武俠小說這個文類如要進一步規劃「次文類」，也許得結合「武」與「俠」在大量作品中呈現出來的不同性質，才能有一個鳥瞰式的統籌。

武俠小說成爲文類的先決條件，是內容上要有武又有俠。但「武」的內容，從還珠樓主的近乎中國科幻，到鄭證因的寫實傾向，到當代幾位名家的別出機杼，顯然各自迥異。而「俠」的定義，從傳統作品的角色鮮明，到金庸及古龍一些作品的面貌不清，更是涇渭分明^⑦。因此，武俠小說這個文類如要進一步規劃「次文類」，也許得結合「武」與「俠」在大量作品中呈現出來的不同性質，才能有一個鳥瞰式的統籌。

「次文類」之外，尚有一個「反文類」(countergenre)的問題。在十六世紀的歐洲，西班牙小說《小癩子》(約在1554年面世)，大概是該世最受歡迎的小說，並因此引起大量的倣作。這類作品多以「自傳性」口脛敘述，情節鬆散，採「綴段式」(episodic)結構，主角是個流浪漢，題材都是出身卑微的流浪漢的旅程。這類小說後來在十七世紀的德國、十八世紀的法國和英國，都有相當成功而且風行的借鑒之作，是歐洲小說的重要類型，一般稱爲「流浪漢冒險小說」(the picaresque novel)。塞萬提斯在十七世紀初出版的《堂吉訶德》，照比較文學專家克羅狄奧·紀廉的分析，雖然也有「流浪漢冒險小說」的痕迹，但卻以嘲弄、諷刺、諧謔的手法，詰難這個流行的文類，使得《堂吉訶德》成爲一個抗拒性的新類型，是挑戰舊類型的「反文類」^⑧。換言之，《堂吉訶德》所承受的，並不是舊文類的正面影響，而可稱爲「負面影響」(negative influence)。這種情況和《紅樓夢》之針對「才子佳人」小說大略相倣。

但在大眾文學範疇，由於其特質是自然重複、互相倣倣、競奪市場，因此「負面影響」而產生對抗性「反文

類」作品的情況，極難出現。即或偶有之，如果市場上成功，倣倣性作品就會大量出現，成爲另一股風潮，原有的抗詰自然也就瓦解。因此，在大眾文學領域，即使偶有個別小突破，難似「反文類」之企圖瓦解舊文類的條框成規，但囿限於大眾文學的性質，並不會完全逆反舊文類，而只是在原有體系裏作些「改革」。當代武俠小說裏，年輕一輩有兩三位作家均有這類嘗試。稍早的顯例自然是金庸的《鹿鼎記》，此書主角韋小寶既不「武」也不「俠」，無疑與一般武俠小說的成規南轅北轍，成爲一大突變；這大概是作爲大眾文學之武俠小說最接近「反文類」的一次表現。

註釋

① 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, "The Culture Industry: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", *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*, trans. John Cumming (1944, 1966, New York: Seabury, 1972).

② Leo Lowenthal, "The Triumph of Mass Idols", *Literature, Popular Culture, and Society* (Pale Alto: Pacific Books, 1961).

③ Fredric Jameson, "Ratification and Utopia in Mass Culture", *Social Text*, No. 1 (Winter 1979), pp. 130-48.

④ Janice Radway, *Reading the Romance: Women, Patriarchy, and Popular Literature* (Chapel Hill: Univ. of North Carolina Press, 1984).

⑤ 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的綜合評述，可參看 *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: Essays on Women, Literature, and Theory*, ed. Elaine Showalter (New York: Pantheon, 1985).

⑥ Laura Mulvey, "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" (1975), *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* (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. Press, 1989); Teresa de Lauretis, *Alice Doesn't: Feminism, Semiotics, Cinema* (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. Press, 1984).

⑦ 結構主義及結構主義敘述學的中文討論，可參看周英雄與鄭樹森合編：《結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》（台北：黎明文化，1980）；周英雄：《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》（台北：三民，1983）；張漢良：《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》頁215-87（台北：三民，1986）；高辛勇：《形名學與敘事理論》（台北：聯經，1987）。

⑧ Claude Lévi-Strauss, *Structural Anthropology*, trans.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Schoepf (New York: Doubleday, 1967), chap. xi; *The Raw and the Cooked*, trans. 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 (New York: Harper, 1969); *From Honey to Ashes*, trans. 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 (New York: Harper, 1973).

⑨ Vladimir Propp, *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*, second edition, rev. and ed. Louis Wagner (Austin: Univ. of Texas Press, 1968); Propp, *Theory and History of Folktale*, ed. Anatoly Liberman (Minneapolis: Univ. of Minnesota Press, 1964).

⑩ 參看古實格在《一木一石》（香港：三聯，1988）裏對金庸的評析。

⑪ Roland Barthes, *S/Z*, trans. Richard Miller (New York: Hill and Wang, 1974).

⑫ Umberto Eco, "Narrative Structures in Fleming", *The Role of the Reader: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* (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. Press, 1979).

⑬ Viktor Shklovsky, "Art as Technique", *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*, trans. and ed. Lee Lemon and Marion Reis (Lincoln: Univ. of Nebraska Press, 1965).

⑭ Boris Tomashevsky, "Literary Genres", *Formalism: History, Comparison, Genre, Russian Poetics in Translation*, Vol. 5 (1978).

⑮ Jan Mukarovsky, *On Poetic Language*, trans. John Burbank and Peter Steiner (Lisse: Peter de Ridder Press, 1976).

⑯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, *Theory of Literature*, third edition (New York: Harcourt, 1963), p. 231.

⑰ 關於中國的俠及俠客傳統之流變，參看龔鵬程：《大俠》（台北：錦冠，1987）及王海林：《中國武俠小說史略》（太原：北岳文藝，1988）。

⑱ Claudio Guillén, "Genre and Countergenre: The Discovery of the Picaresque", *Literature as System: Essays Toward the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*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. Press, 1971).

鄭樹森 生於香港，台灣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，獲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，現任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教授，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。著有《文學因緣》、《奧菲爾斯的變奏》，編著則包括《中美文學因緣》、《現象學與文學批評》、《張愛玲的世界》、《當代女作家選集》、《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》（與周英雄合編）、《中國現代詩歌選》（與楊牧合編）等。